

袁世凱青年時期的導師——袁保齡

劉路生

[提要] 袁世凱青年時期父親和導師的角色，實際上由堂叔袁保齡擔任。袁保齡內任內閣中書、侍讀，參與《穆宗實錄》等重要史書的編纂，外而經營北洋水師重大軍事工程，為同光中興幹臣。他擔負袁氏家族大家長責任十幾年，興辦家學，教育培養子弟，主持析產分家，悉心操辦族人之事。袁保齡給予青年袁世凱切實而實際的幫助，管教他讀書科考，在其人生轉折關頭指引道路，指導他處世做事為人為官之道。袁保齡對袁世凱的提攜教導，對袁世凱一生有重要影響。

[關鍵詞] 袁保齡 袁世凱 父親 導師

[中圖分類號] K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2 - 0169 - 11

一個人成年以後的所作所為，與他出身的家庭，與他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與他青少年時期所處的環境，都是密切相關的。對於袁世凱來說，袁保齡就是影響他最大的那個人。袁保齡（道光廿一年～光緒十五年，1841～1889）是袁世凱的堂叔，袁世凱從 14 歲即跟隨袁保齡讀書，及長從軍、出使朝鮮，袁保齡實際上擔任了導師、父親的雙重角色。

一、袁保齡其人

以收復新疆而功勳卓著聲名蓋世的左宗棠，曾手書對聯一副贈袁保齡：“修竹碧梧美能世濟；元音大呂器本家傳”。^①誇獎袁保齡擁有美好的德行才幹，說袁保齡的這些美德才幹，是從前輩那裡繼承來的，並且能繼續向下傳承。

袁保齡是袁甲三次子、袁保恒之弟。袁甲三，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保恒，翰林院編修，吏部、刑部侍郎。父子兩人都是進士出身，在咸豐、同治年間屢立戰功。袁保齡也志向遠大，境界甚高，直以“要與人間治不平”為胸懷。^②保齡幼有神童之譽，其兄袁保恒稱其幼而聰敏，過兄殆兩倍。^③10 歲通十三經，14 歲中秀才，15 歲補廩生，20 歲中舉人。

袁保齡是在李鴻藻的河南省學政任內中秀才的，被李引為得意門生。李鴻藻是咸豐朝的名翰林，同、光年間清流派領袖。咸豐八年至十年（1858～1860）任河南學政，其後，特拔為同治皇帝老師，任軍機大臣，參與朝政，直至甲午戰後，在中國政壇活躍三十餘年。他在河南學政的任上考試秀才，發現其時十幾歲的袁保齡的才華，當時傳為佳話。現在能看到的有兩封袁世凱給

李鴻藻的信。一封是袁世凱在朝鮮時期，曾經上書給李鴻藻，自稱“小門生”。^④一封是甲午戰爭時期，李鴻藻參與“督辦軍務處”，在東北前線的袁世凱上書稱其“太夫子”^⑤，就是由此而來。

同治元年（1861），青年袁保齡中舉人，“曾國藩一見，目為國士”^⑥。

袁保齡以“欲大魁天下”^⑦為奮鬥目標。在丁憂錯過兩科會試之後，即使補了實缺京官，仍銳意參加會試。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是袁保齡的堂兄，亦非常看好袁保齡，多次預料保齡必能中進士點翰林，乃至中狀元，“奪魁大有可望”^⑧。遺憾的是，陰差陽錯，袁保齡這個志向未能實現。但他飽讀詩書，以所學儒家道理，做為他一生的行為準則。他去世以後，北洋大臣李鴻章上奏摺為之請卹，對他的評價是：“學問具有根柢，識力亦甚堅卓”^⑨。

袁保齡的兄長袁保恆比他大15歲，且非一母所生，但兄弟二人手足情密，志趣一致，相互砥礪，相互商量，相處得十分融洽。袁保恆授任左宗棠的“西征糧台”，在京與保齡分別後，於赴西北途中，寫信囑咐保齡說：“父母望子之心何所究竟，兄不能盡知。以兄愛弟之心，則不止欲弟為才子、為闊人、為一時豪俊，直欲弟為聖賢矣”。“我弟兄各在一方，凡心思想到之處，耳目聞見之處，皆當諄諄互相告語，總以提撕警覺，日進於上，不墜名父家風為最要”。他還說，其信中所寫的，“則有因弟發者，有不必因弟發者。要之，皆閱歷所得，於身心性命有益者，一字一點心血，一語一顆珠璣，無視為老生常談也。凡此刺刺不休，皆其惓惓不已，兄弟之情如是如是。弟有規兄處，亦當諄諄誨我為要”^⑩。

保齡也同樣赤誠愛護長兄。左宗棠軍功顯赫，恃才傲物，缺乏容人雅量是出了名的。袁保恆為其幫辦做糧台，齟齬是免不了的。保齡規勸其兄曰：“辦大事當大任者，有過天下之才，實有涵蓋天下之量。無論在我上者如何陵轢暴躁，總是虛心平氣委曲周旋。……大抵心要靜氣要斂，慮事要深遠，防患要細密。此方是真德行真學問。一切智名勇功且不暇論，況意氣爭執語言文字之間耶。動心忍性拂亂所為。孟子所言，不可不深長思也”^⑪。同治十二年（1873），肅州克復、關內肅清，朝廷以袁保恆辦理西征糧台籌解軍餉始終無誤，加賞頭品頂帶。保齡專門提醒哥哥：“此次聖人之不忘勞臣，與諸老之力行直道，皆非尋常所難覲。惟有此特恩後，季相彌有偏處之嫌，千乞諸自韜斂，持以謙和。至祝至叩”^⑫。

保恆妻子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保恆在軍營做官，帶著她比較麻煩。保齡和堂兄保慶懇談過此事，並特地致信保恆說：“二哥赴南之前，又尚諄諄與弟道此事，謂當隨時相勸。……此情耿耿至今未忘也”。保齡慰勸保恆，一定要帶著這個經常給兄長添亂的嫂子赴任，“畢竟‘糟糠’二字於一生聞望名德大有關係”^⑬。

這些發自肺腑的誠懇勸告，在兄弟二人的通信中所在多有，兄弟之間的關係親密無間，可見一斑，而且說明袁氏兄弟都是用儒家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並相互砥礪的。

袁保齡年青時代，即隨其父袁甲三在軍中佐幕贊畫，在地方督辦團練，有相當的軍功。但由於是親子，袁甲三不為其奏報請功。直到袁甲三去世，才得恩賞內閣中書。

同治五年（1866），25歲的袁保齡升任侍讀，參與校編修纂《剿平粵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穆宗實錄》幾部重要的史書。修纂過程中，賞戴花翎，官銜升為四品。光緒五年（1879）《穆宗實錄》全書告成，保齡以功賞二品頂戴。

在這期間，光緒三年（1877），河南大旱。袁保恆以鄉紳的身份，回籍賑災。不幸感染時疫，於次年春病逝於差次。袁保齡此時是京官，他在料理哥哥喪事的同時，以“兄志未竟，豫民未活，呈請開缺歸里辦賑”，完成乃兄未竟之業。捐去底缺，辭去官職，是需要極大毅力與勇氣的，足

見其以桑梓百姓苦難為懷。袁保齡“盡出家財，益以稱貸，遠近聞風傾助，大河南北，全活無算。舉凡賑災善後，興水利、置農具、靖奸宄”，各項舉措，均稟陳河南巡撫，次第施行。^⑭最後，因賑災有功，升為道員。

光緒七年（1881），北洋大臣李鴻章稱讚袁保齡“諳習戎機，博通經濟，才具勤敏”，以辦理北洋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亟須求賢助理”為由，奏請朝廷將其調到天津^⑮，委辦北洋海防營務。袁保齡說：“此間准練各軍械精餉足，不難認真操練。惜屯戍過久，紀律漸鬆。若不及今整頓挽回，恐數年以後，盡成綠營官樣文章。一旦海疆有事，又將何恃不恐。我自念世受國恩，斷不敢含糊遷就。但恐黑白分明，諸將領不能無怨我者。任事之難，言之三嘆。……每巡夜見文武委員中尚有羊裘如紙者，沖寒步行不敢少息。而我狐裘貂帽穩坐肩輿，有何過人才德，已覺顧慚非分矣”^⑯。

光緒八年（1882），朝鮮發生壬午之變，中國軍隊迅速入朝，平息變亂。袁保齡做為幕府人員，參謀樞機。事後，李鴻章和張樹聲聯名具奏請獎，對袁保齡的評語是：“贊畫軍謀，動中肯綮”^⑰。

是年冬，中法戰爭箭在弦上，而北方海防薄弱。李鴻章派袁保齡赴旅順海口督辦海防工程兼辦水陸軍防務。袁保齡跋山涉海，通籌形勢，分築炮臺做為北洋要塞，在得李鴻章奏請批准後，先修築攔潮壩，於冰雪風霧中督工四十餘天，建成堅穩的大壩和東西兩岸七座炮臺以及無數戰臺，海防頓時強大，最終法國海軍未敢北窺。

北洋海軍創建，袁保齡又奉派專赴旅順督建船塢。他說，“海軍創於北洋，而歸宿在旅順。施工不成，無船塢，則水師終成萍梗。此事關係國家強弱，有不得不以性命爭之者。”^⑱從選址選材到設計施工，事必躬親。所督建的旅順大塢真材實料，做工堅固，經過 120 多年風霜雪雨，到現在仍然在使用。袁保齡說，在修建旅順海防工程時，“我如征夫，遇雨久已一身盡濕，不得脫此衣少休息，而又披上濕衣一件”^⑲。

袁保齡的功績不僅僅是在海防工程上，他還對旅順乃至北洋的海防大局提出了頗具戰略意義的建議。對於初創的中國海軍，袁保齡奉李鴻章之囑，有密建六策之議：重事權、定經制、建軍府、簡船械、籌用費、儲人才。^⑳對於北洋海防的建設，提出嚴防後路，添練士兵，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並且著眼久遠，倡導在隙地種桑柘，教紡織，設學堂。

七年風霜，積勞成疾。光緒十四年（1888），袁保齡在工次突然中風，半身不遂。辭職不獲准，帶病工作。次年七月（1889年8月）病故，年僅 48 歲，英年早逝，以身殉職，為國捐軀。

袁保齡的一生，內而歷官內閣中書、侍讀 13 年，廣覽內廷文獻檔案，於天下要政博考通悉，外而經營北洋水師重大軍事工程。辭世後，在京河南官員聯名上奏朝廷，稱他“勳勤卓著，遺愛在人”、“禦災捍患匪第功在桑梓，而維持大局保障勳勞尤有不可沒者”^㉑，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奏摺，稱他“洵足幹濟時艱”^㉒，實係同光中興一員強將。

袁保齡為人寬厚，不貪不義之財，遇事寧可自己吃虧。在與前任旅順港塢工程總辦黃瑞蘭交接時，公款缺口一千兩銀子之多，袁保齡自己把虧空攬了下來。他說：“我拼吃千金之虧，以存厚道。君子不為己甚，留心田以貽子孫，固勝於留財帛也”^㉓。袁保齡五妹，訂婚光州曹家，未過門先故亡。袁保齡付全部盤費千兩，將其遺體送至夫家安葬，並將五妹遺留下的一千兩銀子，悉數送給其未婚夫婿曹子幹，“我家奩資所有，不以生死易心”^㉔。

他不忘舊人，感恩老師。袁保慶、保恒和保齡兄弟的老師查英波的兒子查以嵩，孤弱貧窘，不能自存。袁保齡曾為他捐官巡檢，在河工當差。^㉕完工後又無事可做，想到旅順投靠袁保齡。因為海防工程實在無查能勝任的差使，保齡於是寫信給九弟保頤說：“查世兄以嵩如仍在津，弟

可訪他面交程儀十六金連信，請其回京。告以我非肯忘師門之人，其如此時真無法想，此心真是抱愧，出於萬不得已也”^②。後來袁世凱到朝鮮，雖不算開府立衙，卻也需人差使。袁保齡寫信給袁世凱說：“我與汝父及三叔父皆先師一手教成，茲特令赴汝處與以差，令其飽暖足矣。”^③查以嵩到朝鮮後，在駐漢城公署“學習各事”，後被袁世凱提拔作“書識”，又為韓人做漢語教師，除俸祿外，可另收入一百元津貼。^④謝子齡，是袁保齡為袁世凱兄弟請的老師。其弟“家貧欲謀出路”，袁保齡即請其兄袁保恆在西征軍內安排一“小差使”^⑤。這種行為，雖然不乏用人唯親之嫌，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他報恩老師的觀念。

二、袁保齡與袁氏家族

項城袁耀東家族，在他青年早逝以後，由他的遺孀郭夫人一手經營維持。到了光緒初年，郭夫人百歲高齡之時，已經五世同堂，子孫並未分家各門立戶。她有四個兒子（樹三、甲三、鳳三、重三）十個孫子（即保中、保慶、保恆、保齡等），還有袁世凱兄弟等一眾曾孫，一族數十口人，有田地四五十頃，成年男子有的在外地做官，有的在籍為紳。閥閱世族，興旺發達，聲勢顯赫，歷經嘉、道、咸、同、光五朝七十餘年。

在眾兄弟中排行老四的保齡，原來是一心力圖上進的青年京官，並未操心不理俗務，家族事務都是父兄料理的。但到了同治末年，家族情況巨變，從同治九年（1870）到同治十三年（1874），5年之中，在外做官的三叔鳳三、二哥保慶，以及在家鄉主持家族事務的四叔重三、大哥保中先後亡故。袁保恆、保齡兄弟，在家族中輩份最崇，年齡最長，聲望最高，於是，家族事務完全落在他們身上^⑥，成了名副其實的家長。光緒四年保恆去世以後，則只有保齡獨力支撐，實際上擔負大家長之責任，長達十數年之久。其主要體現有三：

第一，興辦家學，教育培養子弟，繼承和光大詩禮傳家的家風。

辦家學教導子弟（並惠及近支以及姻親的子弟），是袁甲三以來代代傳承的家風。19世紀40年代，河南地方動盪不安，袁甲三在北京辦家學，將侄子保中、保慶招至北京與保恆、保齡一同學習。^⑦從學者還有族弟登三。後來，袁甲三到豫東剿捻之時，就安排袁保慶在開封負責保齡的讀書請先生之事。^⑧袁保慶到南京任鹽法道之後，也在南京辦家學，請了兩個先生，有世敦、世廉、世凱等四個學生。^⑨袁世凱也曾在朝鮮辦家學，學生有世同（保齡第五子）和袁克定等，還有一個小名錘的少年。^⑩

袁保恆、保齡兄弟於辦家學用力尤勤尤多，規模也最大。保恆任外差常年離京，家學的事情，如聘請名師、督導學生，幾乎由保齡一手操持。今存保恆、保齡兄弟的通信，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討論、通報教育子弟的事。^⑪出於傳統的尊師重道，也出於追求更好的教學效果，袁保齡對於老師百方優待尊敬。他到旅順工地辦差，不常在家，就交代在北京寓中管理家務的九弟袁保頤：“天天陪先生吃飯，以免廚子怠慢”先生^⑫。

在袁保齡的督責下，家學成效斐然。袁世凱是在其教導下糾正少年壞習氣、改正缺點、進步迅速的典型。隨著遷官，保齡先後在北京、天津辦起家學，請來老師，收攏乃父甲三四兄弟（樹三、鳳三和重三）的子孫輩入塾就讀。先後入北京、天津家學的子弟，現在有據可查的人有：袁保頤^⑬、保永、保皖、世敦、世廉、世凱^⑭、世輔^⑮、世勳、世承、世顯^⑯，以及世凱的大姐夫楊益年等。即使未跟著保齡讀過書的，保齡亦通書信教誨之。後來，其子袁世傳說：“我家諸父諸兄曩受先伯（保恆）、先考（保齡）教誨者凡二十餘人”^⑰，應該不是虛言。

第二，立心正直公道，主持析產分家。

時光進入光緒之年，保恆、保齡兄弟當上家長的時候，袁家的精神領袖、數世一堂的維繫者郭夫人年近百歲，日薄西山，離開人世的時刻指日可數，而兄弟兩人終年在外做官，無力料理家政。環顧以下諸弟與近支族內，其德行與能力，無有足可委託擔此重任者。時移世易，延續七十多年的袁氏家族，析產分家成為唯一的選項。因此，兩兄弟的首要任務，也是最大一件事，就是主持分家。這是保恆、保齡兄弟與四叔、大哥聯合主持家政的最大區別。而能否分得人人滿意而又維護世族人家的體面，則成為對新家長保恆、保齡德行和能力的實際考驗。

其時，保恆在西北軍務前線，無暇過多分心，分家方案的擬訂，自然非剛過而立之年的保齡莫屬。現存的家書中，袁保齡和袁保恆共有兩次制定分家析產方案，都是本著公平公正以及傳統的孝悌原則。

第一次，是在同治十三年春袁保恆回家省親時。保齡建議，田契仍歸家長收執，各門頭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效古人計口授田之制，將所有田土分為12股，按保字輩兄弟10人，每人1股。餘兩股專歸家長收管，以1股供祭祀，1股為公眾門事應酬之用。^④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執行，原因不詳。

第二次，是在同年秋天，袁保中去世後，保齡回籍探家，他再次提出，產權方面仍按之前的計口授業方案；使用方面，全部土地按18份均分。現存男丁，甲三、鳳三、重三之子和樹三之孫共保字輩8人、世字輩6人，保中子5人，保慶子1人，共14人，不論新老房頭，不論輩份，只按當下實際，每個男丁分1份，公眾門次應酬雙份，郭夫人雙份。^⑤這個方案，如果按老輩計，鳳三家只有1個獨苗，保慶家也只世凱1人，比較吃虧，保齡提出，若他們有意見，保恆、保齡拿出自己應得的兩份，分別補貼他們。

保齡還進一步主動承諾，儘管分家，仍然將全力幫助培養兄弟子侄們讀書。在致保恆信中說：“弟姪中無論是誰，但可讀書上進，弟必以身任之，必於歸時攜到京塾，以期成就一個是一個”。並且長門伯母（袁樹三妻子王夫人）的供養，以及兩位堂兄大哥保中、二哥保慶的諸兒子，包括世敦、世凱等，“婚嫁之資，竭我兩人（保恆、保齡）心思力量所及，必期使大哥、二哥靈爽悉無遺憾而後已”^⑥。可見這個分家方案是坦坦蕩蕩，大公無私的。

第三，凡族人之事，事無巨細，悉力操辦。這類事例不可勝數，僅隨手拈舉幾宗如下：

保齡三伯祖袁利振是一介平民，沒有後代。他是袁甲三伯父，但袁甲三的餘蔭已經不能顧及到他，墓碑上沒有封典銜號。保齡即獨自出錢為他捐了一個封銜，以免祖塋上列一無字之碑。^⑦三叔鳳三未過門的兒媳婦家貧，保齡每月助其銀十兩，以安頓她和她娘家母親的生活。^⑧

二哥保慶，為人謹厚，精研學問，以暴病卒逝，不及刊行著述。保齡乃將保慶的文稿整理為語錄體《自義瑣言》。^⑨保慶去世後，二嫂牛氏擬攜子女往北京依保恆、保齡兄弟，保齡迅即為其張羅購買房子準備安置（後未成行）。^⑩

胞兄保恆病故後，保齡對嫂侄一家關照尤多。嫂嫂來信索要銀兩，“決不推辭。老境如此，亦可憐也”^⑪。三姐來京寧家探親，返回之時，袁保齡已經贈過百兩銀錢，三姐已經出京至通州上船，保齡仍擔心歸程安頓不夠扎實，特派專人攜盤費追趕送去，並隨行伺候。^⑫

侄子世昌（保中長子）在原籍耕讀，保齡專門寄他銀子十兩，說是“其人循分耕讀可嘉，以此獎勵之”^⑬。弟妹子侄輩的婚嫁，如四妹定親過門^⑭，世凱二姐過門守貞^⑮，五妹定親，保皖續弦^⑯，保齡均為悉心經畫，等等。

三、袁保齡與袁世凱

袁世凱先後經過保中、保慶、保恆、保齡兄弟四人撫養教育。幼年是在生父袁保中，7歲以後是嗣父保慶，14歲時保慶去世以後，則是由堂叔父保恆、保齡兄弟倆履行教育、督導他成人的責任。光緒四年（1878）保恆去世後，至袁世凱成年走上社會，能夠為他提供具體而實際的幫助與指導的，則只有保齡一人了。袁世凱從十五而有志於學，到走上社會初入仕途的青少年時代，也就是他30歲以前的十五六年時間，直接受保齡的教育影響獨多，叔侄二人的感情也最深。從今存叔侄相互之間的家書中，大事細節，隨處可見。

1. 給予袁世凱切實而實際的幫助

袁世凱曾在致三哥袁世廉、二姊袁讓的家書中深情地談論回憶叔父袁保齡對其教養：“吾兄弟皆四叔父大人聲光所致有今日也”。“父親大人去世時，弟方十五，在京從四叔肄業多年”，“三、四叔大人待弟厚而又厚”，“身為胞姪，幼從四叔，父母大事四叔代辦，婚娶功名四叔經理”^⑤。袁保齡給予袁世凱的，就是以父輩撫育下一代的心態，無私的、切實而又實際的提攜與幫助。

同治十二年夏嗣父袁保慶去世，袁世凱說是年方十五，實際還不足十四周歲，扶柩奉母返回家鄉，下一步怎麼辦就成了實際問題。當時，袁保恆在西北前線，袁保齡在京做官。袁保恆、袁保齡兄弟決定接手撫育袁世凱，送他到北京，由袁保齡管教讀書。

袁世凱當時的情況是，官宦人家大少爺，剛剛失去嗣父，嗣母又驕縱，反叛期少年，性情浮躁。袁保齡對他親自督責，重點管教。

首先是善擇僮僕，選用那些“老成可靠”^⑥，“能伺候書房，決不隨幼主為不善者”，開去那些不能規勸幼主甚至誘導小主人行為不軌者^⑦，加強對學生“課外活動”的監督與管理。其次是借重老師，防止弟兄們淘氣偷懶，讓他和哥哥世廉分開房間讀書，安排袁世凱和老師共用的一個書桌，置於老師眼皮底下專門管教。^⑧

袁世凱沒有辜負叔父的期望和付出，甚為刻苦自勵奮進。三四年下來，大有長進。按袁保齡的話說是，已經成長為一個可堪造就的“中上美材”^⑨。這是一個不錯的考語，也說明袁世凱的確今非昔比了。

後來袁保齡外放轉至北洋麾下，到天津、旅順任職，袁世凱亦離開北京回籍，又去山東投奔慶軍，隨慶軍到朝鮮，直到保齡去世的十多年間，保齡始終對他悉心教導，事無巨細，無微不至，尤其利用在北洋的深厚人脈，提供具體而實際的幫助。在今存袁保齡為數不多的朋僚書信中，有幾封是致張謇、潘志俊、張佩綸的。張謇是吳長慶首席幕僚，潘志俊是處理甲申政變善後的欽差大臣吳大澂的主要隨員，張佩綸則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親信幕僚。保齡的用意不言自明。

袁世凱赴朝鮮，遠在海外又身為獨子，安置其嗣母，是必需的事。袁保齡對袁世凱說：“汝母甘旨之畜幾何，據實告我，我當隨時籌之”^⑩，直接包攬其家用。又給住娘家的袁世凱二姊袁讓寫信，規勸她安心侍奉母親，不要抱怨拖累袁世凱，令他無內顧憂，專力建功在外。^⑪

袁世凱在朝鮮，和國內的聯絡，報告國內文書，在未修電報線之前，是用船送到海岸城市，進而轉遞或者轉為電報發到天津的。先是送到旅順，自不必說，袁保齡肯定做得妥貼快捷。後改為送到煙臺經東海關轉送，而東海關道盛宣懷與袁保齡是“同僚至交”，不久，與袁保齡同輩份的盛宣懷竟主動提出與袁世凱結拜兄弟^⑫，袁保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 在袁世凱的人生轉折關頭指引道路

第一，前文說過，在袁世凱失去嗣父之後，袁保恆、保齡兄弟將袁世凱帶到北京，令他走科舉考試正途。在袁保齡的督責下，袁世凱讀完了科舉必須的四書五經，學會了做八股文。在鄉試落第之後，青年袁世凱想走其他途徑，獲取一官半職以謀生，也被保恆保齡兄弟斷然否定^⑤，嚴格命他在京認真讀書，一心科舉正途。

遺憾的是，袁世凱第二次參加鄉試，依然落榜而歸。其時，他已年過二十歲，叔父袁保齡也已準備外放離京，乃決定赴山東登州投奔嗣父的好友吳長慶，在慶軍中謀一生活出路的同時，繼續讀書，再應科考。慶軍首領吳長慶，是有名的愛才儒將，其幕中結納了許多文人，最著名的就是後來中了狀元的張謇。吳長慶視好友的兒子袁世凱若子侄，專門安排張謇教他讀書，指導他學問，要求袁世凱繼續在科舉仕途上努力。袁保齡也支持他的這一選擇，還特地送他路費四十兩銀子。^⑥

第二，幫助袁世凱走上社會，步入仕途。在督責袁世凱讀書的同時，袁保恆、保齡遇有機會，也讓他接觸社會實際。光緒三年，保恆受朝廷之命，回本籍河南主持賑災，就帶上了袁世凱跟隨辦事。上自高層官場交往，下至民間社會百態，鍛煉其能力，增廣其見識，豐富其閱歷。保恆去世，保齡繼承乃兄事業繼續賑災，仍攜帶世凱辦事。袁世凱表現幹練精明，甚獲好評。在賑災結束後，以捐助賑災款的名義獲得朝廷候選中書科中書^⑦的官銜。這是袁世凱得到的第一個官銜。光緒八年，袁世凱隨慶軍入朝鮮，在平定壬午兵變中以“治軍嚴肅，剿撫應機”立功受獎，獲“州同”的官銜。^⑧兩年後主帥吳長慶率部分慶軍內調，袁世凱奉命留駐朝鮮，任“總理親慶等營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李鴻章在奏報中對袁世凱的評價是：“分發同知袁世凱，廉明果毅，曉暢機宜，久辦慶軍營務，兼帶朝鮮練軍，該國君臣均深敬佩，堪以委令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可期得力”^⑨。袁保齡一面為他立功獲獎高興：“何嘗不體面。果能從此奮志立功，亦足伸二哥（指嗣父袁保慶）一生抑鬱”，一面也深感隱憂，說世凱“年少學淺，專恃才氣，最易傾覆。且朝鮮終是危亂之邦，久處殊非福地。我連日思之，極為憂慮。日內當作書苦口教誡之”^⑩。

之後不久，朝鮮發生甲申政變，袁世凱率兵挫敗叛軍，救出朝鮮國王，遭忌得罪駐韓慶軍同僚，不得已以母親有病為由請假回籍。袁世凱回到老家，袁保齡始終縈懷著他以後的出路。幾個月後，清政府準備把已經被軟禁在中國兩年的朝鮮大院君送回國。大院君是朝鮮國王的生父，然而父子死敵，曾兵戎相見。清政府方面先是準備派兵武裝護送，因為要把大院君安全地安頓下來，派兵的方案又被否定，採用文官伴送方案。這就成為棘手的差使。在考慮護送人選時，負責對朝鮮事務的大臣李鴻章十分賞識袁世凱把控局勢臨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在朝鮮積累的人望，這樣，袁世凱的復出就出現了一個契機。

袁保齡抓住這個機會，專門從旅順軍港工地返回天津，處理公事完以後，又逗留天津一個月，往往“夜不能寐”^⑪，為袁世凱處理了甲申政變朝鮮的銀兩虧空之事和其它細節問題，籌謀使袁世凱獲得這趟差使，同時，將消息告知身在陳州的袁世凱，吩咐他預做遠行準備，並叮嚀他要沉住氣，“不能不顧身份”、“萬勿輕動”^⑫，不出則已，一出必成。李鴻章終於下定決心，派袁世凱任此差使，並期盼甚切。^⑬袁保齡此時函電交馳，催促袁世凱按期抵達天津報到，並寫信交代一切，諄囑袁世凱到了天津，謹慎行事低調做人，不擺闊不拜客、不說慶軍吳兆有一句不是。告知袁世凱，赴朝鮮涉及的宗藩外交事項，已經安頓妥當，赴朝同行的武官，也已疏通順暢，後者表示密切配合^⑭，等等，十分周到細緻，為袁世凱此行做好了全面的前期工作。

袁世凱果然不負袁保齡苦心，將大院君送到朝鮮，並在其父子之間調和了關係，將這對生死仇人穩當地安排了下來，圓滿地完成了清政府派給他的棘手任務。

隨後，袁世凱即有正式出使朝鮮之任命。其官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即清政府派駐朝鮮主持外交、通商事務的代表。由於中朝兩國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袁世凱還要代表清政府處理宗藩事務。西方列強並不承認兩國的宗藩關係，袁世凱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居於“半主”，“交際之間，卑亢均難”^③，處境極為尷尬，差使卻事屬初創，“無成例可循”^④。李鴻章深知袁世凱處境艱難，說他是“處群疑眾謗之地”。

這時，袁世凱26歲，其官職和事權，已經不在袁保齡之下了。袁保齡仍然把袁世凱作為青年子侄和官場新手，悉心指導幫助，諄囑袁世凱做事要持重，“務加勤慎”^⑤。

漢城與天津一水之隔，袁世凱赴任之初，既無定期來往交通船隻或商船，亦尚未通電報，與國內的文報傳遞、人員的往返，乃至薪餉銀兩以及必需用品，均要依靠輪流來往仁川的北洋水師兵船運辦。袁保齡囑咐袁世凱留意結交旅順駐軍最高長官宋慶和駐守威海的“北洋沿海水陸前敵營務處”劉含芳，經常通信，通報“朝鮮情形，以見親熱之意，此等處以聯絡眾歡為主，專恃官話，則為我忙者便不高興矣”^⑥。袁世凱心領神會，明效大驗。他還如法炮製，著意結交登萊青道盛宣懷，表示尊敬，顯露才幹，大得盛宣懷賞識，主動提出降低輩份與袁世凱結拜為把兄弟，並從此建立了兩人之間長達十五六年的鐵杆交情。

為了給袁世凱及其駐朝機構提供應急安全保障，袁保齡設想，仿班超出使西域的歷史故實，陰養效忠任事、技藝精良的勇士數十名，優給薪金，給以“六、七、八品頂帽”，以備緊急保衛之需。^⑦袁保齡對於分析朝鮮複雜的宮廷君臣關係，提防朝鮮立場多變的官員、對待中國國內派到朝鮮海關的洋員等各個方面^⑧，都為袁世凱提出了贊畫。

3. 教導袁世凱處世做事為人為官之道

袁保齡對袁世凱完全是父輩心態，拖拉提攜推。袁世凱也對袁保齡的“一片情誼，誠極可感，教誨惟弟能受而奉之，故四叔亦惟喜下教訓於弟”^⑨。

首先是，教導袁世凱立下“報國顯親”的志向，效法先賢，成就一個建功立業的偉人，而不要淪落為征逐名利、虎頭蛇尾的庸人。袁保齡說：“汝以少年早得重名”，盼汝“成就一個大人物，以為報國顯親之地。不願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⑩。而成就為政治偉人的基礎是堅實的學問根底。保齡多次告誡袁世凱，“取宋名臣言行錄，及本朝先正事略，沈心靜氣而細讀之，必有長進處。萬不可師心自用，專靠才智做事，而不濟之以學問，自古及今，未有不敗者。戒之慎之！”^⑪二十年之後，袁世凱成為當朝一品，權傾朝野，而社會輿論詬病他的最要害之點也正是“不學有術”。乃叔之教，大有深意在焉！

其次，教導袁世凱涵養深廣的氣度，寬綽的城府。袁世凱奉李鴻章召赴天津接受重任，這是一揚眉吐惡氣的絕佳時機與地點，袁大可以反訴誣陷他的慶軍將領。但袁保齡鄭重告誡他，“萬勿談孝庭（吳兆有）一字短處，此事關人福澤度量，非僅防是非也”^⑫。說這是體現衡量一個人的氣識與度量的事，是積福修德的善行。袁保齡說：“凡欲集大事者，當時時在人情物理上揣摩著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見，恃我一己之權力，則攸往咸宜矣”^⑬。這一招既折服了對手以及慶軍上下，也為淮系首領李鴻章存留了體面，更重要的是體現了袁世凱氣量不凡，格調高人一等，是個有城府，不計較小事，以大局為重，能任大事的人。這也是不言的辯證。

後來，袁世凱又不止一次遇到類似的事情。小站練兵剛開始不久，御史胡景桂就奏參袁世凱

一本，說他“徒尚虛文，營私蝕糧，性情謬妄，擾害地方”^④。袁世凱挨此悶棍，“兩句來心神恍惚，志氣錯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⑤。雖得驚險過關，心中怨恨，可想而知。待到三年之後，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可巧胡景桂在山東任按察使，成為袁的直接屬官。袁世凱給他“緊緊鞋帶”之類，就夠胡景桂受的了。但是袁世凱主動大度開誠而得體地化解了胡景桂的疑慮。年末，按慣例各省督撫要考察屬官，為每個官員寫一個秘密的“考語”上報朝廷。袁世凱為胡景桂寫了上佳的秘密考語。^⑥再後來，義和團庚子之變時期，袁世凱信任、重用胡景桂，並為胡辯誣，將胡從外國人提出的“禍首”名單中劃掉。^⑦袁世凱對胡景桂化仇為友，深深折服了胡氏，從此竭誠效命。

第三，隨時隨處點撥提醒教導勸誡袁世凱做事做人小心謹慎，戒擺闊、戒輕浮、尚沉穩，尚謙和，重儉約。如：“汝此刻皆危境無安境，從危得安，全賴戒慎恐懼四字，早做夜思，止此戰兢，自持之一念，或者終鮮過失”，“若稍有自私自利自是自滿之心，則韓人伺之，各國伺之，中國官場之妬且恨者又環而伺之，一有蹉跌，悔不可追。思之能勿悚然”^⑧。“汝此次擢太驟，任太隆，旁觀嫉忌者不可勝計，極代憂慮。臨事要忠誠勿任權術，接物要謙和勿露高興，庶幾可寡尤悔。至人生當大任，須要將死生禍福皆置度外，升沉更無足論，認定道理做去，亦不必發無益之愁急，徒損身心也”^⑨。“君子不為己甚，閱世久益知此言有味也”^⑩。“汝做事太快。曾文正公謂劄剛之病在一輕字，我看汝病亦在一輕字。總是讀書太少，閱歷太淺之故。此後，痛自刻責”^⑪。“汝舉動總不免闊，是一大病。家世清白，實無餘資。貧者，士之常，原不怕人笑我。況我既不貪得不妄取，亦復從何闊起。我家先世節儉樸素起家，端敏公及汝父之儉約無人不知，汝此次朝鮮之功，眾論昭然，而吃吳某如此大虧者，即受闊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耶”^⑫。

附說一下，袁家各個重要官場人物都未留下大量財富。即使是當了著名肥差漕運總督的袁甲三、當了鹽運使的袁保慶、當了左宗棠西征軍糧台的袁保恆、執掌軍港工程的袁保齡，亡故後均未留多少財產。袁保恆評論袁保慶說：“身後蕭條，人所共知，此是做官人好下場”^⑬。可見袁家世代以節儉克己為榮，以貪腐為恥。

第四，教導袁世凱慎察左右，慎重交往，知人善任。要效法曾國藩用人之道，“得賢者而推誠任之，厚禮貌優廩餼以給之，大事密事可與商酌，緩急危難可與共”^⑭。陳席珍（號梅村）“其人有吏材，不止筆下明暢，人極方板”，且“頗有聲名”^⑮，可任他“專管機密緊要之事”。而姚文藻（字賦秋）敏快“但太浮而操守心地不可靠，尤好造謊。……倘賦秋知悔知懼改過遷善，留之亦是中等文案”，但“萬勿假以事權”^⑯。結納交遊之人，亦是如此。朝鮮閔妃族人閔泳翊（芸楣）“裙屐年少，見識議論亦頗倜儻透徹，但其人華而不實，非載福之相，恐他日仍不免禍汝。與相處宜加慎焉”^⑰。“芸楣狡黠過人，久遊於外，與西人必有勾連，千萬小心隄備之”^⑱。以後的事實證明，袁保齡所料不差。

第五，教導慎用手中生殺予奪權力。袁保齡以“游勇滋事，不能不略用刑誅”為例，告誡袁世凱，在世道變亂之當今，“我輩居多故之時，掌生殺之柄，執法不得不嚴”，但“存心不可不厚，萬勿奈何而用重辟，當念聖人哀矜勿喜之訓，切勿任意殺人……好殺人者其後多不克昌”^⑲。

第六，袁保齡還告誡袁世凱嚴格約束到朝鮮探訪的親屬，善保自己的名聲。“汝三哥五弟到朝，亦得骨肉天涯歡聚之樂，但勿露面拜客為切囑，勿干預外事，更不必說矣。世路可畏如槍戟，汝任重而望未足，尤須刻刻善自保全，家中人亦必思善保全汝聲名也”^⑳。

袁保齡對袁世凱不僅是嚴父心態，簡直是慈父心腸。袁世凱到朝鮮後，偶染小恙，袁保齡立

即對他諄諄囑咐：“汝軀體甚壯，向無氣痛，大約勞悴之餘，加以憂急而致。天氣太燥，尤宜格外小心。……每早服香砂六君子丸六錢，用麗參湯送下。……開氣之品萬勿多服，暫時取效，後患方深，且愈犯愈重，不可不慎也。刻屆冬至，飲食起居事事加意，切囑切囑”。“寄去冬筍一筐鹽鴨八個”^⑩。“附寄松花江白魚二尾，鹿角百果糕二合，筍橙各一簍”^⑪。“附去洋面四十斤，鹹菜二簍，燒酒十二瓶，衛腿十支”^⑫。“寄汝老藕，即血病瘡，亦可煮湯常吃”^⑬。

四、餘論

後來，袁世凱官做大了，封疆開府，乃至國家元首，識見閱歷都大為超過了袁保齡，但當年乃叔的言傳身教、耳提面命，讓袁世凱受用一生。而袁保齡逝後，再無人能如袁保齡以痛切之言規勸袁世凱了。

保齡去世後，袁世凱逐漸成為袁氏家族新一代的實際領袖人物。他同保齡的兒子們袁世承兄弟等十分親厚，他們大都在幼年、少年，袁世凱義不容辭，盡了兄長的責任。袁世承是保齡長子，世凱與他來往親密。至今保存有袁世凱給世承的家書百十通，字裡行間，可見兄弟二人對家國大事的探討，對家長里短的傾訴，情深意切，十分感人。

前面說過，袁世凱還將保齡的第五子世同接到朝鮮家學，加意培養。後來，把他送到湖廣總督張之洞那裡任候任知府，保升道員。

宣統年間，保齡子世傳、世威主持編纂《袁氏家集》，罷官賦閑隱居彰德的袁世凱的倡導與支持，自是不言而喻的事，他為家集提供了多年珍藏的袁保齡寫給他的家書 15 封。^⑭這部印刷精美的《袁氏家集》煌煌巨冊，不僅是袁氏家族的文獻，而且是近代中國的一部十分珍貴的史料。家集的編纂，袁保齡的後代，居功至偉。

還有一件值得一書的事情。1922 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表示決定捐款 12.5 萬元，為南開建設科學館。不過附有一個條件，南開必須在國內籌得另一部分款項。袁保齡遺孀高夫人知道這件事後，命兒子袁世傳認捐。這是中國婦女第一次捐款建造大學大樓。世傳奉母命捐款 7 萬元，科學館遂於 1923 年興建，取“飲水思源”之意，命名“思源堂”。“思源堂”經歷了將近 100 年的風霜雪雨，現在仍然為南開大學所使用。

①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網站：2015 春拍“吉金樂石——清中晚期書法掇英”專場《左宗棠篆書八言聯》。

② 袁保齡自刻章，袁保齡曾孫袁明軍先生保存。

③⑩⑪⑫ 《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三，宣統辛亥（1911）夏清芬閣編刊，頁一下；頁二上至頁三下；頁十一下。

④③④⑦⑧ 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 2 卷，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401 頁；第 524 頁；第 237 頁；第 237 頁。

⑤ 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 3 卷，第 513 頁。

⑥ 《國史列傳》，《項城袁氏家集·閣學公集》卷首，頁七下。說明：本篇《閣學公集》標題為《國史列傳》，但現行印本《清史稿》、《清史列傳》、《國史列傳》中並未收錄袁保齡傳。又見《行狀》，《項城袁氏家集·閣學公集》卷首，頁十四下。

⑦⑧⑩⑪⑫⑬ 《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二，頁十三下、十四上；頁十一下、十三下；頁三下；頁二十六下；頁二十六上。

⑨⑭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1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50 頁。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四，頁二十八上下；頁十一上、下；頁十四上；頁十二上

至十三上；頁二十三上至二十四下；頁二十四下；頁五下；頁十三下。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五，頁十六下；頁二十四上、下；頁八下；頁二十三下；頁八上；頁二十五上；頁四上、下；頁三上、下；頁十一上；頁五上；頁十一下。

⑭⑯⑰⑱《項城袁氏家集·閣學公集》卷首，頁七下八上；頁十下至十一下；頁四上、五下。

⑮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9，第389頁。

⑰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10，第101頁。

⑱《項城袁氏家集·閣學公集》書札卷，頁四十九上。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六，頁十八下；頁十上；頁十九下；頁七下；頁十九下；頁三十二下、三十三上；頁九上、下；頁二十四下；頁十四下；頁十一下；頁十八上、下；頁二十六下；頁十九下；頁十七下；頁二十四下至二十六上、卷六頁三十上等；頁十七下；頁三十上；頁十六下；頁二十一上；頁二十二上；頁二十下；頁二十六下、二十七上；頁三十一上；頁十三上；二十四上；頁二十下；頁二十二、二十三下；頁十七上；頁二十五上；頁十九上；頁二十一上；頁二十上、下；頁二十三上；頁二十七上；頁三十一上；頁十二下至三十一下。

㉔《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三，頁四上；卷五，頁十九上下；六頁十下、十一上；頁十八上；頁十四；頁十六上。

㉔《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2498頁；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編：《舊韓國外交文書》第九冊，漢城：高麗大學出版部，1970年，第131頁。

㉔袁保齡：“二哥一去之後，我兩人責重累重，一群小兄弟，人人個個須為籌出路計安頓之法長久之策。嗟乎，此後竟無第三人可分，亦並無第三人可說矣”。
《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五，頁一下。

㉔《項城袁氏家集·母德錄》，頁十六上。

㉔參見《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三、卷四兄弟二人來往信函。

㉔《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五，頁一下；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1卷，第2頁；粵北山人主編：《民國文人政要書畫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95頁。

㉔《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五，頁六下至七下、頁十下；另據《民國文人政要書畫集》，第196頁。

㉔《民國文人政要書畫集》，第199頁。

㉔㉕㉖㉗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1卷，第2頁、第10頁；第492頁；第2頁；第102頁。

㉔北洋軍閥史料編委會：《天津市歷史博物館館藏北洋軍閥史料·袁世凱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7～188頁。

㉔沈祖憲、吳闓生編纂：《容庵弟子記》，出版者不詳，1913年，第7頁。

㉔㉕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10，第100頁；第421頁。

㉔《項城袁氏家集·袁氏家書》卷六，頁十六下、十八上；《民國文人政要書畫集》，第200頁。

㉔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2卷，第294頁；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1卷，第61頁。

㉔《清德宗實錄》卷三百八十九。

㉔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4卷，第5頁。

㉔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5卷，第319頁。

㉔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第9卷，第5頁。

作者簡介：劉路生，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廣州 510635

[責任編輯 陳志雄]